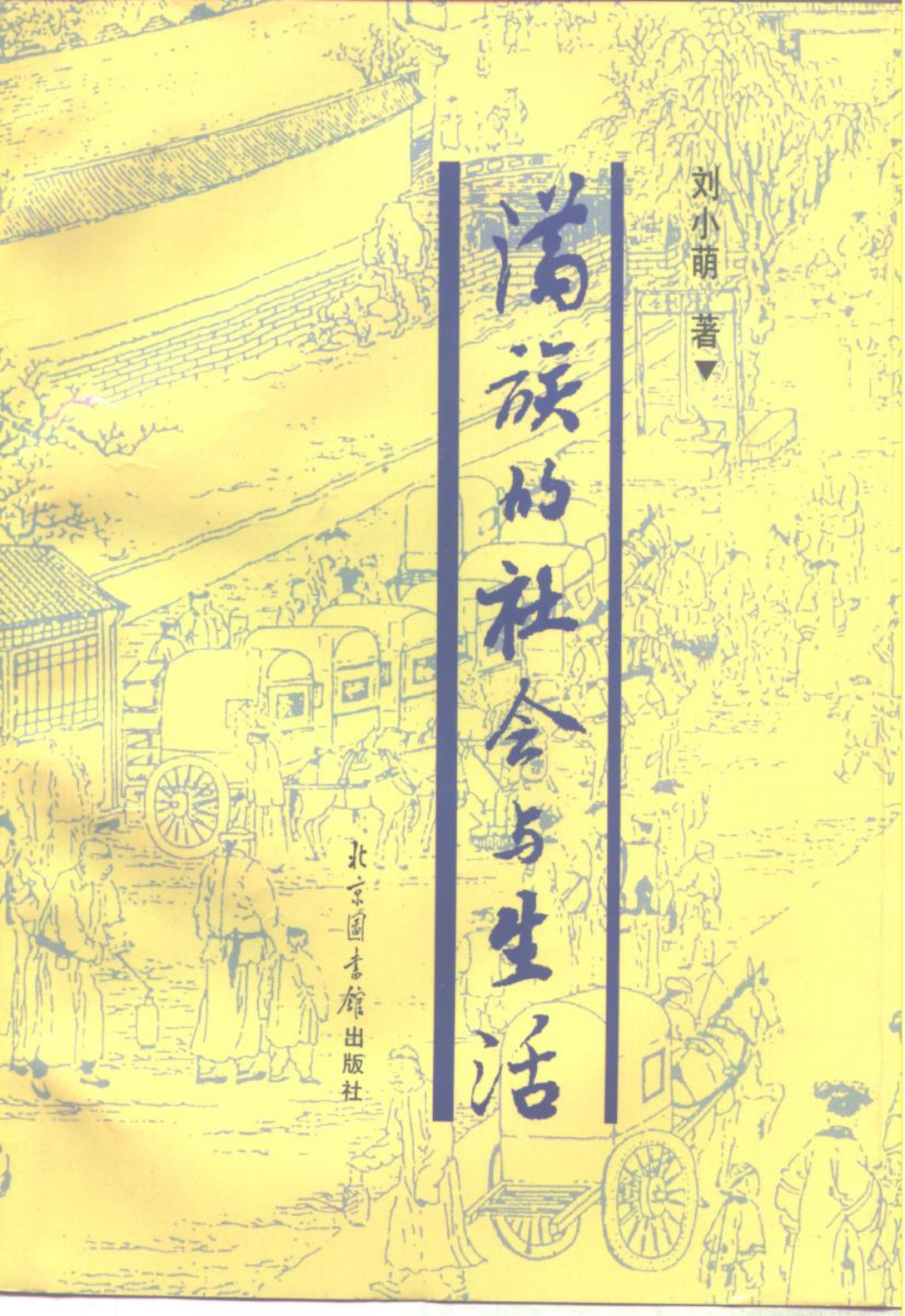




刘小萌
著

满族的社会与生活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刘小萌 著

满族的社会与生活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族的社会与生活/刘小萌著. -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10

ISBN 7-5013-1513-2

I. 满… II. 刘… III. 社会生活-研究-满族 IV. C9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5419 号

书名 满族的社会与生活

MANZU DE SHEHUI YU SHENGHUO

著者 刘小萌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东方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300(千字)

版次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5013-1513-2/K·272

定价 18.50 元

前 言

本书是1987年以来发表的有关清史、满族史论文的一个结集。清史与满族史是两个既独立又密切相关的学术领域。我先后师从王钟翰、蔡美彪两位先生,两位先生的治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注重和擅长民族史与断代史研究的结合,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在两位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也走上了这样一条兼治民族史和断代史的路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研究的对象,则始终围绕清朝史中与满族史息息相关的一些专题。本书之命名《满族的社会与生活》,原因就在于此。

在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诸如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都曾创建国家,但建立过中央王朝的惟有元蒙古和清满族。而无论从享国之日久,对中国影响之深巨来说,后者又超过了前者。满族所建清朝,开疆拓土,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统治跨越了古代和近代。满族人的文治与武功,他们的崛起与蹉跎,辉煌与失败,无不给中国的历史打下了鲜明的印记。研究清史,不能不了解满族史,反之亦然。因此,对满族历史与文化兴趣盎然的绝不仅是她的近一千万族裔,这笔财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满族先世肇兴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以后迁徙辽东,最后入主中原,走过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她从渔猎文化的基盘起步,最终却成为土著农耕之民,在社会发展、文化变迁的同时,与汉等民族的关系也不断得到发展。

收入本书的共 25 篇论文,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满族肇兴时期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法律制度。我曾在蔡先生指导下从事博士论文的准备,论文题目为“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围绕这一专题,陆续发表了一组论文,内容集中在明代女真血缘组织、地域组织以及国家制度的创建上。第二,八旗制度。八旗是清代满族军、政、经合一的社会组织,也是清朝旗、民分治两元体制的重要支柱,它与清朝统治的兴衰堪称血脉相通,故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我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旗人的经济生活,分布格局,身份特征,以及与民人关系的变化。第三,满族文化。初步探讨了满族早期渔猎文化的特点,及其与毗邻蒙古、汉等民族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的互动和涵濡。

满族的历史与文化,绚丽多彩,蕴涵丰富。对它的探究,需要代代学人执著努力。如果本书的出版能对这项有着光辉前景的事业略尽绵薄之力,是我所期望的。

我从求学到治学,十几年里始终得到王先生和蔡先生的悉心教诲。“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他们的渊博学识和敬业精神,令我终身受益。我在学术上的进步,还曾得到其他许多先生师友的热情帮助和鼓励。在收入

本书的论文中,《台尼堪考》和《试述清朝乾隆年间的东北流民及其对旗人生计的影响》两篇是与定宜庄女士合写的。本书出版,得到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特别是孙彦女士的鼎力相助。值此之际,谨向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收入本书的论文因散见于各种刊物,体例不一,这次作了统一处理,同时更正了文字上的讹夺衍误。摆在面前的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成果,存在着不少疏漏和错误,衷心希望得到读者指正。

作者谨识 1998年5月22日

目 录

有关满族开国史的古籍整理与研究	(1)
明代女真血缘组织哈拉穆昆的动态分析	(13)
明代女真的血缘家族“乌克孙”	(25)
明代女真的地缘组织——噶栅	(35)
明代女真社会的酋长	(46)
明末女真社会氏族制度的瓦解	(60)
满族肇兴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	(81)
关于满族肇兴时期“两头政长”的撤废问题	(96)
论牛录固山制度的形成	(104)
满族习惯法初探	(118)
天聪年间皇太极限制贵族特权的法律措施	(135)
八旗户籍中的旗下人诸名称考释	(152)
关于清代八旗中“开户人”的身份问题	(163)
试析旗下开户与出旗为民	(175)
库图勒考	(187)
台尼堪考	(200)
试述清朝乾隆年间的东北流民及其对旗人生计的影响 ...	(211)
清前期东北边疆“徙民编旗”考察	(225)
乾、嘉年间畿辅旗人的土地交易	(244)
从房契文书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产	(262)
清代北京旗人的房屋买卖	(283)

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	(322)
从满语词汇考察满族早期的经济生活·····	(347)
满族萨满教信仰中的多重文化成分·····	(363)
满族肇兴时期所受蒙古文化的影响·····	(375)

有关满族开国史的古籍整理与研究

满族是继蒙古族以后,在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建立起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在清代近三百年统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研究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是满族史的重要课题。满族建立起的清朝,继承了历代封建王朝的体制,但是又带有不同于前代的许多特征,对于这些特征,如果不联系满族的早期历史,往往难以说明。清初满族虽处在社会制度迅速变革的阶段,但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它的某些落后性,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发展又曾一度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研究满族早期历史,对清朝制度史、政治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外满族史、清史学界发表了不少有关明代女真和清入关前满族历史的论文论著,但大多偏重某一专题的研究。如何从制度史的角度,对元末以迄明季三百余年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形成进行比较系统的说明,仍是一个有待努力的工作。

满族的先民女真,几乎没有留下关于自身历史的文字史料,考察这段历史主要依据当时外部明朝、朝鲜的一些记载,以及后来清朝满族统治者对其祖先业绩的追述。

朝鲜世代与女真民族为邻,历史关系悠久。与我国明朝同期的朝鲜,由于国力比较单薄,对东北境剽悍的女真部落不能不持有强烈戒心,比起以泱泱大国的明朝来,显然更关注女真社会的动向。因此,在研究女真史和满族兴起史方面,朝鲜史料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朝鲜李朝实录》(简称《朝鲜实录》),是朝鲜李氏王朝用

汉文记载的官修史书。李朝建于1392年,止于1910年,基本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始终。《朝鲜实录》大量记述明代女真在东北和朝鲜沿境的活动,特别是关于女真社会内部的调查和报告,是我们在明朝官私史籍中绝少看见的。《朝鲜实录》卷帙浩繁,全阅不易,日本学者从30年代初开始整理《朝鲜实录》,并从中摘抄女真(满)、蒙古史料,直到1954年《满蒙史料》才陆续出版,至1959年共十五册全部出齐,这部史料的重要价值在于对各种版本认真校勘,并编有人名地名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吴晗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二册,全书三编,上编收明代女真史料。

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和李民寅《建州见闻录》,是考知满族兴起之际社会状况的两部珍藏,以往流传甚稀。1939年日本稻叶岩吉将《建州纪程图记》收入所著《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使珍本得以传布。1978年至1979年,辽宁大学历史系将两书收入《清初史料丛刊》印行。

明代汉文史料首推《明朝实录》,其中系统记录了明朝与女真诸部交往、战和的历史,有关卫所设置、贡敕制度的资料尤为翔实,但殊少对女真社会内部状况的报告,其中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导致的隔膜更摭拾可见。1940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共五百册,今以196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的王崇武、黄彰健等人的校勘本为佳。日本京都大学的学者从30年代初着手《明朝实录》的校勘整理,从中辑出有关满蒙史料,1954年至1959年全部出齐共十八册,内《满洲篇》八册,殊便使用。《明会典》是汇录明朝一代典章制度的书,始修于弘治年间,目前通行的是万历十五年(1587)的重修本,其中涉及女真卫所制度、朝贡回赏等内容,均分门别类,便于考索。《辽东志》、《全辽志》是有关明代东北的两部志书,前书为嘉靖十六年(1537)重修本,后书成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实即《辽东志》第三次修定本,所载辽东马市、陆

路交通、女真诸部风俗习惯的资料弥足珍贵,金毓黻将两志收入《辽海丛书》,并进行了认真校勘。《皇明经世文编》是成于崇祯十一年(1638)的一部明人文集汇编,所收奏疏记述了不少明代女真与满族肇兴时期的史事,可补正史缺文,1962年中华书局据明刊本影印。

明季记女真(满族)史事的私家笔记很多,但多非身历其境之作,故道听途说、陈陈相因者不少。价值较高的有,程开祜辑《筹辽硕画》四十六卷,收录万历、泰昌、天启朝内外臣僚关于辽事的奏疏,保留了有关满族建国前后的若干珍贵史料;冯瑗《开原图说》二卷,记海西女真史事翔实可靠;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十四卷,其中第十一卷专记女真各部行迹,及其与明朝、蒙古关系;茅瑞徵撰《东夷考略》,作者历官兵部职方主事、郎中,素悉女真状况,所述非漫然命笔。

满族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从毗邻各先进民族得到不同的益处。特别在早期,蒙古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蒙古文史籍除记载两个民族密切交往的历史外,还保留着有关满族早期历史的一些宝贵片断。大约成书于17世纪初叶的蒙古族重要史籍《蒙古黄金史》(朱风、贾敬颜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罗卜桑丹津原著,海外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译注的《蒙古黄金史》(台湾出版事业公司版)是两部最重要的珍藏。罗福成类次《女真译语》、贾敬颜、朱风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在考证女真名物制度等方面也有参考价值。

清代满汉文献是可资利用的又一大宗史料。清朝官书往往抹杀早期历史实情,对与明朝、朝鲜的关系忌讳尤甚。清修《明史》对女真史实少有记述,或者语焉不详。乾隆年间官修《满洲源流考》,将满洲世系上溯先秦肃慎,但于明代女真活动反竭力遮掩,无此通病的仅《满文老档》。《满文老档》指满族入关前用无圈点老满文书写的编年体官方史书,乾隆年间复用新满文重抄。原本残缺,今存

天命前九年(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清崇德元年(1636)部分,是研究满族兴起史的第一手原始资料。1918年,满族学者金梁延聘人员翻译老档,1929年将部分译稿以《满洲老档秘录》名义刊布,其后又将部分译稿在《故宫周刊》连载,题称《汉译满洲老档拾零》。金梁译文只求达雅,信则不足,为后人所病,其实首事之功不可泯没,可惜此后数十年间老档在国内几无人问津。1939年,日本出版了藤冈胜二的《满文老档》日译本。50年代,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等组成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至1963年七册出齐,用罗马字母转写满文,下附日文,逐词直译,是日本学者整理《满文老档》的一项突出成绩。1964年,台湾学者广禄、李学智开始译注《满文老档》原本,即无圈点老满文原档,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以后以《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为名出版了两册,体例与《满文老档》日译本类同,满汉对照,下附汉语译文。《原档》所记有为《老档》不载者,其史学价值不言而喻。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将天聪元年(1627)至五年(1631)的老满文原档译为汉文,是台湾学者整理满文古籍的又一成绩。

1990年,中华书局终于印行了由国内学者集体译注的《满文老档》,是国内满族史、清史学界的一桩盛事。这部译著纠正了前人译本的一些缺失,反映了《老档》翻译的新水平。但由于未录满文原文,加之个别地方抄写有误,所以在依据满文审音勘同、考证名物等方面,日译本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整理翻译出版清初满文档案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特别是198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是继《满文老档》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译著,无异于《满文老档》的补编。这样,关于满族建国初期的历史,便有了由满文档案和清朝实录并行的两套史料,两者可以互为参稽补充。另外,台湾学者李光涛、李学智自1959年以来先后编辑《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三集,初集包括《沈阳旧档》三十八件,二集收

录老满文档案四件,均为研究满族开国史的珍藏。

《满文老档》记事起自1607年,对于这之前的满族历史只有求诸《满洲实录》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前书体例为历朝正史所无;以满蒙汉三体对照行文,又附图绘七十七帧。是书虽最后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但文字主要取材满文老档,图绘则源于天聪九年(1635)完成的《太祖实录图》,故保留了比较古朴的面貌,堪称研究满族早期社会制度、族源世系、肇兴事迹的瑰宝。1938年,今西春秋出版了《满和对译满洲实录》,将满文转写为罗马字母,用日文逐词直译,下附汉文原文,书末《注释》对书中涉及的主要制度或史事逐条铨释,抉微阐幽,是一部集史料整理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著作。近年,台湾学者陈捷先撰《满文清实录研究》(《满文档案丛考》第一集),对《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的沿革关系进行了穷源竟委的考辨。

清朝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确立“首崇满洲”原则,重视对本民族历史的研究整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等一批官修史籍应运而生。《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书成于乾隆九年(1744),满汉两种文本,据明清档案笔记家乘等写成,是探明满族早期血缘组织形态变迁与牛录固山制度发展的重要参考文献。1989年,辽沈书社据武英殿本影印,附有姓氏人名索引。《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乾隆四年(1739)书成,专记八旗制度与八旗人物。其中,《旗分志》和传记部分是考镜满族早期人物与牛录源流的重要凭依,例来为史家所重,今通行北京民族文化宫1983年复印本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校勘本。神田信夫曾将《八旗通志初集》和《二集》中列传和人物志所收人物编为索引,1965年东洋文库满文老档研究会以《八旗通志列传索引》为名印行,是研究满族历史和八旗制度的重要工具书。此外,《清朝开国方略》、《清朝通志·氏族略》、《清史列传》等官修史书,也较有参考价值。

日本学者自 20 世纪初即着手满族史料的搜检,对满族早期历史的研究开拓早,用力深,成绩斐然。白鸟库吉、内藤虎次郎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30 年代稻叶君山撰为《清朝前史》、《满洲发达史》,至今仍有学术参考价值。这一研究在三四十年代达到高潮,涌现出鸳渊一、户田茂喜、旗田巍、今西春秋、三田村泰助、中山八郎、园田一龟、安部健夫、周藤吉之等一批知名学者。以后,他们的研究大多结集出版,主要有:周藤吉之《清代满洲土地政策研究》(1944 年)、园田一龟《明代建州女直史研究》(1948 年)、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1955 年)、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的研究》(1965 年)、安部健夫《清朝史的研究》(1971 年)等。50 年代以来,日本的研究队伍仍具备很雄厚的实力,出现了阿南惟敬这样以研究八旗制度称名的专家。1992 年日本又出版了河内良弘的《明代女真史的研究》,堪称研究明代女真社会历史、经济生活、对外关系的精审之作。

明代女真的部落组织,内部又包括血缘组织与地域组织,关系比较复杂。1935 年,旗田巍发表《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收入《满洲史研究》,1936 年),依据 15 世纪中叶《朝鲜实录》有关图们江流域女真部落的调查报告,对建州女真吾都里(斡朵里)部的内部结构进行了精细考证,认为其村落已非血缘集团,而且贫富差别相当明显,据此得出吾都里部氏族制度已经崩溃的结论,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成果。三田村泰助在前后发表的《满珠国成立过程的考察》(1936 年)、《明末清初的满洲氏族及其源流》(1960 年)、《穆昆塔坦制的研究》(1967 年)中贯彻了一个基本观点:由于女真的老氏族组织过于庞大,不能再履行各项社会职能,于是从哈拉分化出的穆昆逐渐取而代之,后者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血缘组织,是决定女真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三田村泰助祖述内藤虎次郎,持明代女真社会氏族制度说,故不免忽略氏族组织日呈瓦解的种种征兆。尽管如此,他的论著无疑构成对女真社会组织最为系统的考察,不

少观点颇有见地。

噶栅(即村寨)是女真部落内的基本地域组织。旗田巍《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最先剖析噶栅的内部结构。他在《关于满洲八旗成立过程的考察》(1940年)中,进一步研究噶栅的规模,探明了噶栅规模小的特点。并且认为,“噶栅、乌克孙(以及穆昆)是满洲早先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1944年,《史渊》三十二期发表了江岛寿雄的《明末清初噶栅的各种形态》,依据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的记述,将建州女真的噶栅分为四种类型,但未就噶栅的性质和内部关系作较为详尽的说明。这种根据观察得到的相似性和差异,把噶栅组织加以分类的方法,有助于对不同类型噶栅的特征进行概括并彼此进行比较。此外,中山八郎《明末女直和八旗体制的素描》(1936年)、今西春秋《满和对译满洲实录》(1938年)的《注释》、鸳渊一、户田茂喜《诸申的考察》(1939年)等文,也曾就女真社会的血缘、地域组织问题各抒己见。

女真社会组织的细胞是家庭。日本学者不仅注意分析家庭中贫富分化现象,而且揭示了家庭制度的特点。内藤虎次郎曾在《史林》七卷一号发表的《清朝初期的继嗣问题》一文中指出:幼子继承制度是蒙古和满洲的传统。时在1922年。尔后,旗田巍《关于建州三卫的户口》(1940年)提出:女真素有父子兄弟分居的习惯,男子成年后即依序离开父亲,另居一户,财产也分别占有。

女真部落管理机构主要由大小酋长组成,旗田巍《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认为,吾都里部酋长是强盛家族的代表。田中通彦在《十五世纪女真族社会和初期努尔哈赤政权的结构》(载《历史人类学》第三号,1977年)一文中进一步说明,吾都里部的村落内分为主体家族和从属性的依附家族,前者保持较明显的聚居,内部分化也更显著。在《明代女真族的社会构成》(载《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纪念东洋史论集》1976年)中他表示:女真酋长的身份具有双重性质,对于部民既有强制和剥削役使的一面,又有依赖的一面,这种

状况与部落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阶层分化有关;大小酋长及其一族是奴隶的占有者,一般成员则缺少耕牛等必要的农业生产手段。

到明末努尔哈赤崛起之际,满族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从传统社会组织和管理机构中逐步脱胎出新的政治组织和公共权力机构。鸳渊一、户田茂喜的《诸申的考察》、三田村泰助《穆昆塔坦制的研究》、安部健夫《八旗满洲牛录的研究》等文,依据《满文老档》卷七九至八一的《穆昆塔坦档》,对努尔哈赤的早期政权与性质分别发表了意见,尽管说解不同,均成为今天研究的起点。

由牛录组合而成的八固山,又习称“八旗”,是满族进入国家时代的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日本学者历来重视对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牛录是固山的基层组织,关于它的源起、建制年代、内容与性质,中山八郎《关于明末女直和八旗制度的素描》、《关于清初兵制的若干考察》(载《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51年)、安部健夫《八旗满洲牛录的研究》、三田村泰助《初期满洲八旗之成立过程》、旗田巍《关于满洲八旗成立过程的考察》均作了专门研究,在牛录组织的氏族制起源上求得了共识。中山八郎的文章突出了牛录与哈拉穆昆的关系;旗田巍认为牛录是若干噶栅、乌克孙的结合;安部健夫强调牛录是经济组织,养兵的基本单位。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的认识。松浦茂《努尔哈赤的徙民政策》是一篇独辟蹊径之作,认真考察了努尔哈赤将海西女真、东海女真诸部迁徙入旗政策及其实施过程。在八旗制度研究方面,阿南惟敬是颇有造诣的学者,论文集《清初军事史论考》(1980年)重点探讨满族建国以后八旗制度的一些专题。努尔哈赤将被征服的众多族寨编入固山牛录,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村落制度。周藤吉之《清代前期八旗村落制》(1972年)对此问题详加考察,增进了人们对八旗组织深层结构的了解。

“八王(即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体现出了满族国家的重要特点,1936年,中山八郎在《关于明末女直和八旗制度的素描》中首

先提出这个问题,在《清初努尔哈赤王国的统治机构》(载《一桥论丛》十四卷二期,1944年)中利用《满文老档》,作了进一步研究。以后继续探讨的有鸳渊一《清初的八固山额真》(《山下先生还历纪念论文集》1938年)、神田信夫《清初的贝勒》(1958年)、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等,后文是针对神田信夫考证的八和硕贝勒而写的,对其中的多铎、多尔袞提出异议。日本学者治学扎实严谨,曾在《满文老档》、《朝鲜实录》等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上花费了很大精力,注重语言工具的掌握,所以在满族早期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

国内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孟森先生。孟先生著述宏富,尤于清先世事迹潜心钻研,长期致力于编纂《明元清系通纪》,对有明一代女真史事疏理钩稽,193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1927年商务印书馆印行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篇《后金汗国之成立与发展》,叙满族兴起建国,但于政治制度的创建言之颇简。30年代,吴晗在从《朝鲜实录》中摘抄有关中国史料的同时,从中录出建州女真酋长李满住事迹,撰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并就明代前期建州三卫酋长的关系多所考订,刊于1934年《燕京学报》十七期(原名《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

在民国时代,满族早期历史研究尚处在低潮,直到50年代,始趋繁兴。张维华《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1954年)、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与《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1956年)、莫东寅《满族史论丛》(1958年)的发表,表明国内学者开始探讨满族早期社会历史诸问题,在挖掘利用《满文老档》等原始资料方面,也开风气之先。进入70年代以后,王钟翰主编《满族简史》(1979年)、《满族史研究集》(1988年)、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一册(1980年)、郑天挺《探微集》、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1981年)、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1983年)、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册(1986年)、李洵主编《明清史》、孙进己、张璇